

## 高适早期诗歌风格初探

路歌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开元、天宝年间是高适诗歌创作的高产期, 也是其艺术成就的顶峰时期。尤其是他的《宋中十首》《蓟门五首》《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这三首组诗, 代表了其早期人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情感认知。诗人从一开始停留在个人得失的悲愤, 到北入燕赵亲身感受到边塞之苦的雄壮, 再到客居淇上时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切体察, 这些思想情感的变化无一不表现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 从而奠定了他诗歌创作所具有的现实关怀与悲壮诗风。

**关键词:** 高适 组诗 早期诗歌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高适是我国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经历了唐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几朝, 其成年之后的主要生活经历及文学创作时期主要集中在玄宗、肃宗两朝, 尤其是集中在开元、天宝年间。

根据孙钦善校注本《高适集校注》一书中对高适生平年谱的考证, 高适早年长安求仕失败后客居梁宋长达十二年, 开元二十年北游燕赵并滞留数年, 随后再次赴长安应征, 落第后客居淇上三年便返回宋中, 一直到天宝三年才开始与李白、杜甫等人同游梁宋等地, 直至天宝八年授封丘尉, 才开始了他的宦游生涯。

高适诗歌创作的风格, 学者惯以“慷慨悲壮”加以概括形容, “作为盛唐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 高适的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同时的许多诗人, 应时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 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 使他的诗有一种慷慨悲壮的美”<sup>[1]</sup>, 该观点代表了当代学者对于高适诗歌的总体看法。

综观高适的诗歌, 我们可以发现其作品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独立于同时代诗人之外的风格, 是在他早期的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开始仕途生涯之前, 甚至可以说在他还未与同时代的优秀诗人交游之前, 便已经形成了他鲜明的诗歌特色。而这种特色集中表现在他早期所创作的三组诗歌中——《宋中十首》《蓟门五首》<sup>[2]</sup>与《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 这三组诗歌分别作于他仕途失意后客居梁宋、从戎不成后旅居燕赵以及长安落第后客居淇上三个时期, 这几段经历对诗人的思想情感与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奠定了诗人早期诗歌创作风格的总体基调。因此, 本文主要通过这三组诗歌来考察高适早期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与思想内涵。

### 一、高适早期诗歌内容

<sup>[1]</sup> 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第209页.

<sup>[2]</sup> 孙钦善校注. 高适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第37页.《全唐诗》本诗诗题作“蓟门行五首”, 此处从孙校本。此外, 文中所引高适诗歌篇目均出自本书, 不再作注。

唐代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留下了十分灿烂辉煌的历史，“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有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有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sup>[3]</sup>高适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

#### （一）壮志难酬之“悲切”

开元七年，二十岁的高适自以为书剑已成，大展才华的机会已经来临，只身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自己可以“屈指取公卿”，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朝堂却是“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这样一番景象，入仕之门已为权贵所握，诗人不得不无奈地发出“安知憔悴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的悲愤之语。在求仕失败、灰心丧气之余，高适自开元八年左右，离开长安，东过洛阳，在宋州宋城县寓居下来，从此开始其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宋中生活，其间偶有漫游。《宋中十首》便是创作于诗人客居梁宋前期，在这组诗中诗人借由对历史伟人的缅怀、赞颂，抒发了自己报国无门、不被重用的愤懑。为便于分析，现择其第四、第五首诗，兹录于下：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时。君王不可见，修竹令人悲。九月桑叶尽，寒风鸣树枝。

#### （其四）

登高临旧国，怀古对穷秋。落日鸿雁度，寒城砧杵愁。昔贤不复有，行矣莫淹留。

#### （其五）

该组诗前三首分别对宋中地区历史上的贤君明主进行深切缅怀，分别写到了：“宾客复多才”的梁孝王、“时清更何有”的刘邦以及“三请皆不忍，妖星终自移”的宋景公，诗歌言辞之中流露对他们丰功伟绩的赞颂和由衷的景仰之情。但是诗人的落脚点仍在于“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亦或是“白云长不还”、“禾黍遍空山”的慨叹，曾经辉煌一时的豪杰伟人也会随时间流逝而远去，他们创造的清平盛世也随之不再。诗人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内心对时光流逝、明主不再的惆怅感伤的同时，也是在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该组诗第六至第九首同样缅怀古代与宋中有关的圣贤：诗人“忆昔鲁仲尼，凄凄此经过”，“逍遥漆园吏，冥没不知年”，“常爱宓子贱，鸣琴能自亲”，通过评述他们的生平业绩，将自己的钦羨之情贯穿诗歌全篇。最后一首则寄托了自己背井离乡的感慨。

在全组诗中，第四、第五首是此时诗人精神世界所想所思的集中反映和高度概括。作者采用今昔对比手法，选取“秋草”、“寒风”、“落日”、“鸿雁”等灰色意象，制造出凄凉的意境，发出物是人非的感慨，点明“君王不可见”、“昔贤不复有”的主题。从这十首诗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诗人面对渺茫的前途、坎坷的际遇愤懑不平而又无能为力的悲切。而这种“悲切”，贯穿了他前半生的诗歌创作。其《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一诗有言：“登顿驱征骑，凄迟愧宝刀。远行今若此，微禄果徒劳”；还有《蓟中作》一诗云：“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均表达了因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而滋生的深沉失落的悲慨，使高适早期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苍凉与悲切的艺术风格。

<sup>[3]</sup> 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第217页.

## （二）亲历边塞之“雄壮”

在唐代，士人进入幕府是一条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据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载：“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sup>[4]</sup>高适也试图通过入幕来得到任用，从而施展自己的抱负。

高适一生有三次出塞的经历，亲临边塞的经历使得他对于征战生活有了深入的观察与体会，这种艺术实践使得诗人在边塞诗创作中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素有边塞诗人之称，《蓟门五首》就是创作于诗人第一次出塞期间。开元十八年，寓居宋中长达十余年的高适决定“单车入燕赵”，毅然前往东北边塞，结束了宋中初期的寓居生活。他“北游燕赵，至信安王幕府，欲入幕从戎，未遂愿。此游期间深入了解边塞情况、军中内幕，写出不少深刻反映现实的边塞诗篇”<sup>[5]</sup>。

《别冯判官》一诗写在高适在临赴东北边塞前，诗云：“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遥知幕府下，书记日翩翩”。诗人看到这一时期唐王朝与奚及契丹的战争爆发，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只身前往燕赵，希望在边塞博取功名。诗人此次出塞带有极大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同时也是踌躇满志、势在必得的，因此他此次出塞的心情是豪迈雄壮、意气风发的。晚年高适作有《酬裴员外以诗代序》一篇，诗中回忆了自己早期的这段经历：“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单车入燕赵，独立心悠哉。宁知戎马间，忽展平生怀。且欣清论高，岂顾夕阳颓”，便表达出了这种豪迈气概。但是不久之后，诗人投谒不中的失望便在军中士卒悲辛、边塞风光苍凉的渲染下一泄而出，诗风也变得沉痛悲凉。“伊余寡栖托，感激多愠见”，诗人游于燕赵之时，所见多令人愤怨之事，他以饱含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蓟门五首》等一系列揭露现实的诗作。

高适出塞前的诗歌创作，其诗歌风格主要以悲为主，而出塞之后，其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宋城寓居时以“悲”为主的诗风的基础上，加入了“雄壮”之气，呈现出其诗歌中豪放的一面。《蓟门五首》均是以六句写成的五言古体诗，该组诗从诗人与一位“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的老兵的相逢讲起，将读者的视野引入“黯黯长城外”“黄云愁杀人”的塞外。“蓟门逢古老，独立思氛氲”二句不仅是第一首诗的首联，也可视为整首组诗的总起句，诗人纷繁的思绪都从这段相逢荡开来去。第二首诗人痛斥了边关戍卒食用匮乏而投降的胡人却丰衣足食的情况，表达了对戍卒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言辞悲怆，感人肺腑。第四首诗赞美了崇尚勇武的幽州少年，通过描写他们秋天在草原上狩猎的英姿，称颂了守边戍卒的骁勇善战。第三首与第五首分别表现了敌人顽勇、战事无休的边塞时局，诗人坦言敌人的强大，而面对其屡屡侵袭，戍边的士卒始终奋不顾身地英勇斗争。

从思想内容来看，《蓟门五首》不仅表达了诗人对战事纷纭、连年不休的无奈以及对戍边士卒的赞扬与同情，而且也流露出对朝廷穷兵黩武政策的批判。更令诗人潸然泪下的是，

<sup>[4]</sup> (宋)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85页.

<sup>[5]</sup> 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385页.

边关将士奋勇征战、抵御胡戎的同时，却还要承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压力。“自唐王朝建国以来，统治者解除民族偏见，军中大量重用少数民族将领和士兵，对周边民族来者不拒，多迁以内地，对来降的将领，多赐以官爵，待遇甚是优厚。”<sup>[6]</sup>面对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诗人感受到无比的愤懑，其《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中亦云：“戎狄本无厌，羸靡非一朝。饥附诚足用，饱飞安可招”，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此外，诗人在《蓟门》（其五）一诗中的景色描写十分出彩，描绘了日落时分，茫茫的长城之外，战争的烟尘仍在涌动，远处黄云滚滚，古树布满空塞的场面。此情此景，怎么能不愁煞人呢？类似的景色描写使得其诗歌的情感更加“慷慨悲壮”。

### （三）投身现实之“深沉”

开元二十三年，三十五岁的高适应征赴长安，落第。长安应制失败后，次年“营别业客居淇上”，开始了短暂的淇上寓居生活，期间曾“自淇涉黄出游，秋深始归”，《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便创作于此次漫游之时。虽然与前期寓居宋中时一样，诗人依旧过着一种耕读漫游式的生活，但是在这组诗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诗人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仕途的成败与否，而是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纳入诗歌创作中来。

在仕途上接连受挫的诗人，作有《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一诗云：“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且欲同鸕鷀，焉能志鸿鹤”，通篇激愤之语，可以窥见诗人此时已经萌生出了“归隐”的意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文学史所言：“在盛唐士人中，那种消极遁世、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者是没有的。”<sup>[7]</sup>因此“高适的归隐，并不是真正的归隐，而是在屡经波折后寻求一个安身立命，静养修身之所，是一种无奈中的归隐，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消极的逃避，因而我们不能将他的淇上寓居或说淇上归隐等同于同时代一些真隐者的归隐生活。”<sup>[8]</sup>

《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这组诗是高适在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夏秋之间，自淇上渡黄河归至梁宋时所作，描述了诗人渡黄河途中的所见所感。这“组诗对社会时事的关注、贤士不遇的感叹、自我遭际的感概等主题表达，直抒胸臆的表现方法，与陈子昂《感遇》皆一脉相承。然而高适组诗中的玄理思辨色彩、苍凉孤寂之气又明显不如陈子昂《感遇》，体现出淡雅闲婉之态<sup>[9]</sup>”，因此也往往被视为是受陈子昂影响而创作的一组咏怀诗。葛晓音在《论开元诗坛》一书中对其做了简要概括，她认为这十三首诗“将沿河古迹，两岸风光，途中见闻和旅思羁愁揉为一组感遇诗，或借比兴寄寓不得展翅的孤闷；或述农夫之苦，表达献芹无因的遗憾；或观测天道人心，行写幸遇‘圣代’的自豪；或评论古人功业，思考历代人才的归宿。”<sup>[10]</sup>对比前两组，该组诗明显呈现出一种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在这组诗中，有“亲友若云霄，可望不可攀”、“长想别离处，犹无音信还”、“独行

<sup>[6]</sup> 王彦明. 高适宋中三十年研究[D]. 西藏民族学院, 2008.

<sup>[7]</sup> 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第260页.

<sup>[8]</sup> 王彦明. 高适宋中三十年研究[D]. 西藏民族学院, 2008.

<sup>[9]</sup> 杨国荣. 唐代组诗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sup>[10]</sup> 葛晓音. 论开元诗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第337页.

既未惬，怀土怅无趣”的乡思旅愁；有“飞鸣无人见，饮啄岂得所？云汉固尔知，胡为不轻举”、“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自昔有贤才，相逢不相识”的失意不平；有“圣代休甲兵，吾其得闲放”的功名志向；有“耕耘日勤劳，租税兼乌鹵”、“潮涌陵堤防，东郡多悲辛”民生多艰的时事感叹。除此之外，整组诗中征引最多、被视为代表了这一时期高适思想的典型诗作就是第九篇：

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乌鹵。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

全诗通过诗人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白描的手法，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农村荒凉凋敝的生活场景。诗歌前四句交代了诗人自北而南的行程路线，在途中深切感受到了“农夫”之“苦”，诗人通过与农民的交谈得知，他们日常的农业生产不仅要遭受天灾的威胁，还要承担繁重的租税，辛勤的劳作仍然改变不了穷困的生活，这不得不令诗人深感痛心。于是诗人在最后两句直抒胸臆，表达其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以及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这首诗中，诗人将抒情和叙事、写景融为一体，自然、真切地展示了自己的深沉悲痛和报国无门的愤懑。游国恩对其有这样的评价“在开元时代诗坛上，高适是首先接触到农民疾苦的诗人。”<sup>[11]</sup>

此外，高适第三篇诗作中借黄鹄自况：“清晨泛中流，羽族满汀渚。黄鹄何处来，昂藏寡俦侣。飞鸣无人见，饮啄岂得所。云汉尔固知，胡为不轻举。”诗人借由“羽族”反衬出黄鹄洁身自好的品行。诗人以黄鹄自况，心中虽怀有云汉之志，却在飞鸣之时无人所见、无人所知，亦不为世人所重视，因此饮啄也不得其所，不能与其才智相比肩。诗人并非不想像黄鹄一样直入云霄，一鸣惊人，而是苦于“飞鸣无人见”，不被人所重。他隐居于此的目的，或是说他所等待的，正是这样一个让他“飞鸣”且有人见的机遇。

高适的这三首组诗，代表了其早期人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情感认知，通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境界是逐步拓展了的，从一开始的自怨自艾、停留在个人得失，到北入燕赵体察到边塞之苦，再到客居淇上时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切体察，这些思想情感的变化无一不表现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来，从而奠定了他诗歌创作所具有独特的思想体悟与情感表达。

## 二、高适早期诗歌的特点

### （一）追随陈子昂的“复古”诗风

五言诗是初盛唐之际的主流诗体，五言古诗的发展也在盛唐时期达到顶峰。从诗歌史来看，五言诗从汉代开始，就已经成为了诗歌创作的主要体式，至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始终兴盛。“初唐时期的五言古诗最初与汉魏六朝时期的五言诗差别不大，被看作是六朝诗的延续，或者是唐代五言今体诗的滥觞。继‘初唐四杰’之后，陈子昂提出了鲜明的诗歌革新主张，对于唐代五言古诗的发展和盛唐五言诗的兴盛有着重要意义。”<sup>[12]</sup>陈子昂在《与东方左

<sup>[11]</sup> 游国恩主编. 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sup>[12]</sup> 郑菡培. 出入于诗与歌之间[D].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史虬修竹篇》中便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sup>[13]</sup>

胡应麟认为：“唐初（五古）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sup>[14]</sup>《中国历代文论选》中也肯定了陈子昂对唐诗的贡献：“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自觉的倡导者。他的理论和创作对齐、梁以来的不良诗风，起了‘横制颓波’的作用，产生出‘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影响。”<sup>[15]</sup>陈子昂的《感遇》诗在体式上，“努力恢复汉魏古调，突破了初唐时期诗歌创作讲究声律，注重排偶的传统，在诗歌中大量使用叠字、虚字。虽然后人批判陈子昂‘复多而变少’，但陈子昂的《感遇》已经是标准的五言古诗，摆脱了初唐五言诗古、律不分的局面，使得唐代五言古诗和五言今体‘双峰对峙’，从而迎来了盛唐的辉煌。”<sup>[16]</sup>因此，“盛唐文坛年岁较长的高适，作为‘古雅’诗派的‘第一传人’，与陈子昂的师承关系较同时代其他诗人更为直接”<sup>[17]</sup>。这样一位标杆式的人物，亦影响了高适的诗歌创作，而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其早期诗作当中。

与高适同时代的殷璠在收录他的诗作时为其作小序：“评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诗多胸臆语，兼有骨气，故朝野通赏其文。”<sup>[18]</sup>日本学者宇文所安对殷璠的理解是值得注意的，他将“胸臆语”理解成为“表达有力豪壮情绪的语言……指的是抒情的语言……‘胸臆语’形成与豪壮人物相联系的强烈有力反应，它们是‘悲壮’的语言，而悲壮是与古风相关的类型术语。”<sup>[19]</sup>

高适标举“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的创作倾向，其诗多用古体，气势豪迈，格调雄壮，激昂的“胸臆语”中间，正是子昂之“风骨”理论的具体表现。因此，“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中，高适与陈子昂力追汉魏而来的浑厚质朴诗风最接近。”<sup>[20]</sup>通过前文对高适早期诗歌的分析，其对陈子昂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诗歌体式上，多用五古

高适现存的二百余首作品里，各种诗体均有涉及。据学者统计，分别有“五古 123 首，五律 70 首，五绝 7 首，七律 12 首，七绝 13 首，七古与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共 20 首”<sup>[21]</sup>。通过统计数目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五言古诗是诗人诗歌创作的常用诗体，也是其诗歌创作

<sup>[13]</sup>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 216 页.

<sup>[14]</sup>（明）胡应麟. 诗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 35 页.

<sup>[15]</sup> 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 121 页.

<sup>[16]</sup> 郑菡培. 出入于诗与歌之间[D]. 河北师范大学，2018.

<sup>[17]</sup> 余正松. 古雅同源 前后辉映——陈子昂与高适之比较[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2）：1-9.

<sup>[18]</sup> 原文出自殷璠《河岳英灵集》，此处转引自陈伯海主编. 唐诗汇评（第二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1307 页.

<sup>[19]</sup> 宇文所安. 盛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 177 页.

<sup>[20]</sup> 刘秀秀. 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在盛唐的接受[D]. 湖南大学，2015.

<sup>[21]</sup> 郑菡培. 出入于诗与歌之间[D]. 河北师范大学，2018.

中的代表性诗体。日本学者宇文所安在评价《蓟门五首》时讲到：“与陈子昂的著名组诗《蓟丘怀古》具有相同的形式和风格。两组诗都采用了六行体……”<sup>[22]</sup>而这种风格亦体现在《宋中十首》组诗里，并且宇文所安认为“《宋中》甚至比《蓟门》组诗更接近陈子昂的《蓟丘览古》”<sup>[23]</sup>。

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作有小序云：“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sup>[24]</sup>该组诗通过缅怀燕昭王、乐毅、燕太子丹、田光、邹衍、郭隗等人的事迹，表达了作者对盛世的向往、对古贤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其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感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高适的《宋中十首》与《蓟门五首》，无论从形式还是风格上，都明显沿袭了陈子昂的创作旨趣。从以下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共鸣：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陈子昂《燕昭王》<sup>[25]</sup>)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高适《宋中其一》)

虽然高适诗中并未出现任何摹仿陈诗的字句，但是两首诗所呈现出的情绪与风格却是极其相似的。两者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繁华转瞬即逝的一种悲凉，应是不得意有感而作，然而在孤立无援“寂寞向秋草”的悲凉中却蕴含着一种气势，“悲风千里来”并非一种低迷之状，让人有悲壮之感。

汉魏古诗呈现出“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质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sup>[26]</sup>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在高适的诗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就诗歌体裁而言，高适最喜欢作古诗，他的五言古诗占其全诗的近一半，所以胡震亨评价高适诗“黯淡之内，古意犹存”<sup>[27]</sup>，这是对他深得“汉魏风骨”的赞赏。由此可知，高适在其早期诗歌写作中便已经自觉地承袭这种“复古”的创作理论，并且其早期诗歌除了声名大噪的《燕歌行》和极少数诗作之外，都是以五古的形式进行创作，可以说，这是诗人主动选择的结果。

## 2、多“胸臆语”

殷璠评论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宇文所安将其理解为一种“抒情的”“悲壮的”“表达有力豪壮情绪的语言”，这样的理解不免显得对“胸臆语”三字进行了过度的

<sup>[22]</sup> 宇文所安. 盛唐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第180页.

<sup>[23]</sup> 宇文所安. 盛唐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第184页.

<sup>[24]</sup> 陈伯海主编. 唐诗汇评(第一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第273页.

<sup>[25]</sup> 陈伯海主编. 唐诗汇评(第一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第274页.

<sup>[26]</sup> (宋)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第4页.

<sup>[27]</sup> (明)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第86页.

阐释。综观高适的诗歌可以发现，他的大部分诗作都呈现出一种不工于雕琢、质朴古直的语言风格，但往往给人以“澹语绝妙”之感。如他的《宋中》（其九）有：“邑中静无事，岂不由其身”一句，语浅言深。

高适早期的五言古诗创作语言自然流畅，呈现出口语化的特点。“由于五言古诗不受声调的限制，可平可仄，也不受篇幅的限制，可长可短，诗人可以自由地抒发情感，所以高适在诗歌体裁运用上多采用这种可以发挥自身艺术特长的体式来进行创作，尽力追求诗歌形式和内容、语言艺术的统一。<sup>[28]</sup>”高适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创作“雕章镂句”少，而多“胸臆语”，显得自然流畅。高适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尤其体现在对于农民生活和农村景象的描写上：

野人头尽白，与我忽相访。手持青竹竿，日暮淇水上。虽老美容色，虽贫亦闲放。钓鱼三十年，中心无所向。

这首诗记录了高适客居淇地时与当地的一位隐士交往的趣事，这位老人三十年来在淇河以垂钓谋生，生活虽然清贫但安之若素、精神矍铄，诗人通过“手持青竹竿”“钓鱼三十年”等生活口语的运用，晓畅明了地向我们刻画出一个“中心无所向”的隐士形象。《唐定风》评论此诗：“高浑，绝去炉锤。”<sup>[29]</sup>所谓“绝去炉锤”，即是指该诗不事雕琢，自然浑成的特点。这种“胸臆”之语，集中表现在高适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在他进入官场尤其是入幕河西之后，其诗作开始呈现出较为深奥、规整的特点。如他在天宝十一年离开长安赴陇右途径金城郡时所作的《金城北楼》一诗：

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垂竿已羨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

这一首诗已然没有诗人早期复古的质朴风格，此时的诗人显示出一种胸有成竹的“老辣”，首联以“北楼西望”的视角铺展开来，颌联一处写“湍上急流”，一处写“城头残月”，逐渐拓展诗歌所呈现的意境，“颈联以姜尚、李耳分帖，略作开合之势，运用绝妙。落句言边庭有甚事，而令人起羌笛之怨”<sup>[30]</sup>，四联之中精心雕琢却依旧浑成，含蓄之中又耐人寻味，已然是一首十分工整精致的律诗。

## （二）对其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

### 1、现实主义倾向

高适宋州前期所经历的困顿、不遇，加之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使他对盛唐气象之下的种种社会问题认识的也更为深刻，这也奠定了高适诗歌创作的情感基调，将视角投向广大的社会底层人民，关注民生疾苦。在北游燕赵时期，本着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风格，加之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现实的深刻体验以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原则，高适对当时军中

<sup>[28]</sup> 郑蓓培. 出入于诗与歌之间[D].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sup>[29]</sup> 原文出自《唐定风》，转引自陈伯海主编. 唐诗汇评（第二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323页.

<sup>[30]</sup> 原文出自《诗式》，转引自陈伯海主编. 唐诗汇评（第二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351页.

种种矛盾与黑暗现实，也是有所揭露的。尤其是客居淇上时期，高适对底层人民“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鹵”的穷苦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一时期诗人作《东平路中遇大水》一诗：“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圣主当深仁，庙堂运良筹。仓廩终尔给，田租应罢收。我心胡郁陶，征旅亦悲愁。纵怀济时策，谁肯论吾谋。”诗人运用了白描的手法，记录了东平百姓经历久雨侵淫肆虐田园、生灵涂炭的悲凉景象，对“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的困顿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时策”，希望仁厚的君主能够及时颁布“良策”，开仓赈粮，减免田租，安抚民情，更加凸显了高适对现实的关怀。

可以说，早年间的的生活经历对高适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为其成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奠定了基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适在这类反映现实的诗作中，总是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种“济世者”的姿态，反映民间疾苦并非是他的最终目的，诗人所要追求的是有朝一日可以“纵怀济时策”，试图发挥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现状，这一点所呈现出的正是高适身上具有的盛唐诗人的心胸与抱负。

## 2、“悲壮”诗风的形成

现实遭遇让高适愤慨不已，他在诗中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强烈的悲壮感。高适早期诗中颇多怀古伤今之作，但并非是一种低迷情绪的流露，相反地，他的诗中总是饱含豪情。

特别是高适早期北入燕赵的经历，使他深受燕赵文化的影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了一种“悲壮”的情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对燕赵文化有着这样的描述：“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sup>[31]</sup>韩愈在《送董召南序》中也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在此种风气的影响之下，燕赵文化特色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即是呈现出一种“慷慨悲歌”、“雄浑悲壮”的格调。有两次燕赵之行、数年燕赵生涯的高适，从个性到诗歌创作，都深受燕赵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以“雄浑悲壮”“慷慨悲凉”为主的风格特征。

正如余正松在《高适研究》中所说：“读高适的诗，那如骏马注坡，鹰击长空的雄放之气，无不动人心魄”，“不但展现出蓬勃向上、璀璨壮美的‘盛唐气象’，同时也凸现出诗人性格豪爽、抱负远大和刚毅勇敢的精神面貌”<sup>[32]</sup>。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高适早期的诗歌创作之中，“相较而言，高适后期诗作，一则数量较少，再者，前期的慷慨奔放、悲壮激越已明显退却，显得深沉委婉。”<sup>[33]</sup>郑振铎对高适大加赞赏：“他的诗也到处都显露出以功名自许的气概。他不谈苦空，不使酒骂座，不故为隐遁自放之言，不说什么上天下地，不落边际的话。他是一位‘人世间’的诗人……为的是一位慷慨自喜的人，又是一位屡次独当一方的大员，

<sup>[31]</sup>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第3264页.

<sup>[32]</sup> 余正松. 高适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 1992, 第148页.

<sup>[33]</sup> 孙力平, 刘育霞. 试议高适前期诗作[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7(04):361-366.

所以他的作风，于舒畅中又透着壮烈之致，于积极中更露着企勉之意”<sup>[34]</sup>。

### 三、结语

日本学者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一书中对高适有着这样的评价：“高适基本上是盛唐的第一代诗人，在相对地独立于同时代京城诗人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独立风格。高适是一位理性的诗人，了解并强烈感受到历史的影响，超过了对同时代诗歌才子的感受。他在成名之后，与同时代诗歌有了较接近的接触，这使他成为一位较平庸、较缺乏独创的诗人。”<sup>[35]</sup>宇文所安将高适的“成名”视为其诗歌创作的分界点，综观其诗歌，这是十分合理的。《旧唐书》记载：“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sup>[36]</sup>在动辄自比王侯的盛唐诗人中，高适是唯一做到高官而封侯者。“高适是唐代诗人中位至通显者，入幕河西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高适入河西幕府使其诗歌风格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高适诗歌由原有的‘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sup>[37]</sup>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分界，将其诗歌分而论之。

高适是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既承载了恢弘豪迈的盛唐气势，又流露出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异的特质，而他早期的人生经历正是产生其独特诗风的渊源所在。他在第一次长安应试失意之后，选择客居宋中，此时因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而滋生的深沉的失落与悲慨，使得其作品呈现出一种苍凉与悲切的艺术风格。游于燕赵之时，诗人所见多令人愤怨之事，他以饱含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蓟门五首》等一系列揭露现实的诗作。寓居淇上之时，他有感于田园生活，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山水田园诗作。无论是仕途受挫的愤懑，还是初涉边塞的悲壮，以及田园生活的体验，这些复杂的情感交织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成为其独特的审美旨趣。可以说，高适早期是其诗歌创作的高产期，也是其艺术成就的顶峰时期。

### 参考文献

- [1] (汉)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 (宋)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 (宋)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5] (明) 胡应麟. 诗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6]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
- [7] 游国恩主编.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 [8] 余正松. 高适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sup>[34]</sup>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 第 323 页.

<sup>[35]</sup> 宇文所安. 盛唐诗[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第 178 页.

<sup>[36]</sup>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第 3328 页.

<sup>[37]</sup> 马海龙. 论唐代文人入幕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高适入河西幕府为例[J]. 兰州学刊, 2017(09): 118-129.

- [9]葛晓音. 论开元诗坛[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0]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11]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2]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 [13]宇文所安. 盛唐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4]孙钦善校注. 高适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15]陈伯海主编. 唐诗汇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16]王彦明. 高适宋中三十年研究[D]. 西藏民族学院, 2008.
- [17]杨国荣. 唐代组诗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 [18]刘秀秀. 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在盛唐的接受[D]. 湖南大学, 2015.
- [19]郑菡培. 出入于诗与歌之间[D].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 [20]余正松. 古雅同源 前后辉映——陈子昂与高适之比较[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2):1-9.
- [21]孙力平, 刘育霞. 试议高适前期诗作[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7(04):361-366.
- [22]马海龙. 论唐代文人入幕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高适入河西幕府为例[J]. 兰州学刊, 2017(09):118-129.

## Preliminary Study on Gao Shi's Early Poetic Style

Lu Ge

(Hunan University,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The years of Kaiyuan and Tianbao were the high-yield period of Gao Shi's poetry creation, and also the peak period of his artistic achievements. In particular, the three sets of poems—"Ten Songs in Song Zhong", "Five Songs in Jimen", and "Thirteen Songs from Qi to the Yellow River" represented different emotional cogni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early life. From the beginning, he stayed in the grief and indignation of personal gains and losses, and h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the majesty of the frontier fortress soon, and then he wandered at Qi where he deeply perceived the life of the bottom people. These changes in thoughts and emotions are all reflected in his poems. As a result he laid the realistic care and tragic style of poetry in his poetry creation.

**Keywords:** Gao Shi; Group Poetry; Early Poetry